

港澳台大学生高校志愿服务赋能思政教育的路径研究

江勇，陈怡琳

暨南大学，广州 广东 510632

DOI:10.61369/EDTR.2025110026

摘要：在“大思政课”建设背景下，提高港澳台大学生的思政教育水平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以群际接触理论与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为框架，分析了港澳台大学生志愿服务赋能思政教育所存在如下问题：思政课程体系的结构性割裂、赋能动力机制的功能性缺失、志愿协同网络的系统性梗阻、智能技术赋能的联动性不足。研究继而从制度、动力、组织、数字维度提出构建双向融合框架、实施激励保障机制、搭建湾区协同平台、构建智能反馈系统的赋能路径。研究进一步认为，通过“实践参与—情感共鸣—价值内化”递进机制，港澳台大学生高校志愿服务能有效促进港澳台大学生的国家认同，为铸牢港澳台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长效支撑。

关键词：港澳台大学生；高校；志愿服务；思政教育；赋能路径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Empowe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Volunteer Services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Jiang Yong, Chen Yili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Abstract :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onstruction of "Gr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enhanc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in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has positi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common internal group identity, analyzed the following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empower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volunteer servic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structural fragment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system, functional deficiency of the empowerment dynamic mechanism, systematic obstruction of the volunteer collaboration network, and insufficient interactivity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empowerment. The research then proposes empowerment path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system, motivation, organiz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including building a two-way integration framework, implementing incentive and guarantee mechanisms, establishing a collaborative platform in the bay area, and constructing an intelligent feedback system.

Keywords : college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university; volunteer servi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mpowerment path

一、研究缘起

思政教育作为港澳台大学生认知国情、重塑身份认同核心载体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党和国家始终坚持将思政教育作为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指示“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并强调将“把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效融合起来^[1]”。针对在陆就学的港澳台大学生的思政教育主要是围绕国情教育进行，具体从爱国主义教育、文化体验活动及课程替代等形式展开，存在实践路径单一、缺乏长效性等问题。近来，随着“大思政课”建设的不断深化与高校志愿服务工

作的持续推进，将高校志愿服务作为连结“课堂”与“社会”的桥梁已经成为学校乐于接受，学生普遍接受的方式。然而，机械式社会志愿服务并不能有效促进思政教育，例如部分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目的并不是因为活动本身能给其成长及思政素养带来颇丰裨益，而是基于志愿时长积累及其背后所带来评奖评优价值。因此，开展在陆就学港澳台大学生高校志愿服务赋能思政教育的路径研究变得极为重要，实有必要从志愿服务的相关理论入手，结合高校思政教育的实际情况，开展赋能路径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从群际接触理论及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出发，为促进港澳台大学生的思政教育提供志愿服务视角的助力，这同时也印

课题信息：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3年度志愿服务研究专项青年项目《港澳台大学生高校志愿服务与思政教育的融合赋能提升路径研究》（批准号：GD23ZYF10）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江勇（1990-），男，江苏射阳人，博士，研究方向：港澳台研究、法律实证；

陈怡琳（2000-），女，福建莆田人，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港澳台研究，未成年人犯罪。

证了协作志愿服务育人效果与国情教育增强国家认同感目标的高度耦合性。

二、赋能相关理论阐释

在高等教育场域研究港澳台大学生志愿服务如何促进思政教育问题，需要在基本概念基础上扎实理论研究。就港澳台大学生之特殊群体而言，既需要在志愿服务一般概念的基础上突出高校志愿服务的特殊性，又需要在大思政基础上辨析思政教育的独特性。就赋能理论而言，群际接触理论与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为志愿服务促进思政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持。

(一) 群际接触理论

群际接触是指存在文化差异、偏见或冲突之不同群体间的互动过程^[2]，其为跨文化群体的互动提供了理论研究视角。群际接触理论认为，存在文化差异或潜在冲突群体间的积极互动效果并非自然发生，而高度依赖特定条件如群体地位平等、拥有共同目标、开展实质性合作及获得权威制度支持等条件的优化配置。良好的群际接触是通过合作性依存关系直接提升好感与改善态度、在互动中建立的新规范促进相互接纳；在接触过程调节情绪、减少焦虑并培养共情（如跨群体友谊）^[3]。利用群际接触理论来研究志愿服务是基于志愿服务自然地符合群际接触最优条件场域的事实，即在国家政策为互动提供坚实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志愿者在爱老护幼、传播知识、扶贫助困等行动中体现了服务社会之崇高目标有效超越群体差异的目的。

在志愿服务场域中，实证研究表明当港澳台大学生深度参与内地研学、志愿服务等需要协同才能完成的实践活动时，其国家认同提升尤为显著。以在陆就读台湾地区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数据也同样佐证，“深度登陆”式的接触比“短期观光”式接触更容易影响其国家认同^[4]。可见，将志愿服务作为群际接触的特殊形式，既通过社会互动建构参与者多重身份角色，强化自我概念定位，又在承担社会责任中确认个体价值信念，形成“奉献—成长”双向驱动，继而有效地实现身份认同与价值认同的主体性建构。概言之，港澳台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建构效力可源于实践自然催生的情感共鸣与价值共振。当将此发现应用至港澳台大学生的思政教育领域时，志愿服务与思政教育本就在立德树人的价值目标、实践主体、实践到认知闭环的形式内容上存在深刻的耦合逻辑^[5]。国情教育作为港澳台大学生的思政教育的核心，其传统模式的局限如体系模糊、内容单一、方法创新不足等正可借志愿服务得以补足：当港澳台学生通过环保治理、社区服务等项目与内地同伴协作时，制度差异的抽象认知转化为具身化体验，政策文本中的“国家”概念具象为携手奋斗的同伴面孔。这种创新是群际接触理论的创造性转化——通过设计包含共同目标、平等互动和制度支持的接触情境，使国家认同建构从说教转向情感浸润。

(二) 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

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由Gaertner与Dovidio基于对“厌恶型种族主义”（aversive racism）的长期研究提出。该理论揭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

理机制：个体在潜意识中对外群体存有消极情绪，却在意识层面主张公平原则，这种矛盾导致跨群体交往中的回避行为，并在社会规范模糊时以隐晦方式表达偏见。其根源被追溯至社会认同理论与自我分类理论揭示的核心机制——人们通过社会分类强化内群体相似性与外群体差异性，形成内群体偏好与外群体贬抑。为消解此类偏见，Gaertner与Dovidio提出重构社会分类的路径：当原本分离的群体被纳入更高阶的上位群体，形成共同内群体认同时，对内群体的积极情感将延伸至新群体成员^[6]。这一转化依赖四大前因条件：群际依存性（合作目标与命运共享）、群际差异性弱化（增强相似性感知）、平等化情境（规范支持与地位平衡）及预接触经验（认知与情感启动）。成功构建共同内群体后，个体将对外群体成员在认知层面形成积极群体评价，情感层面激发共情联结，行为层面推动互助协作。

志愿服务恰为实践该理论提供了理想场域。以港澳地区大学生与内地大学生的合作志愿项目为例：通过设计共同目标社区振兴任务、设置分工互补的团队作业来强化协作依存、在政策保障的公平环境创设平等互动及激活身份叙事如“中华大学生志愿者”上位认同等操作有效引导参与者卷入共同范畴化进程^[7]。研究表明，此类高质量群际接触不仅能改善跨群体态度，更通过三重机制深化国家认同：其一，协作实践增进对国情现实的具体身份认知；其二，情感共鸣在共担挑战中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其三，行为反馈将合作成果转化为认同内驱力。当港澳台大学生在服务中亲历“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效能，国家认同便从概念认知升华为情感依附与实践自觉。传统国情教育常面临认知、情感割裂的困境，而依托共同内群体模型的志愿服务，能实现三阶跃迁：从知识传递到体验内化——协作任务深化国情理解、从符号认同到情感归属——共情纽带激活共同体意识、从个体学习到群际共建——合作行为固化集体身份。因此，在思政体系中深度融合志愿机制，通过突出目标互依性来优化项目设计、彰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使命等强化身份整合、依靠政策消除地位差异来构建平等场域，可形成“认知——情感——行为”螺旋强化的育人闭环，最终达成国情教育与价值认同的协同升华。

三、港澳台大学生高校志愿服务赋能思政教育的困境分析

从群际接触理论与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出发，根据港澳台大学生高校志愿服务开展的实际情况，对标思政教育的具体要求，研究发现至少在课程思政体系、赋能动力机制、志愿协同网络、智能技术赋能层面存在结构性、功能性、系统性及联动性的困境。

(一) 思政课程体系的结构性割裂

港澳台大学生高校志愿服务赋能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显著的课程体系结构性断裂。这种割裂体现为课程定位边缘化、教学内容碎片化、实施机制失序化三重困境。首先，顶层设计的缺位使课程定位悬浮，多数高校不仅将其定位为“课余活动”或“团学实践”，也未设计专门针对港澳台大学生的志愿与思政课程，甚至未将港澳台学生的人才的思政培养纳入思政教育的核心模块。

与此同时，在课程考察方面也缺乏学分认定与学时保障机制^[8]。这种定位偏差导致两大矛盾：其一，资源分配失衡，针对港澳台大学生的志愿服务依附于一般大学生的志愿服务活动，相当部分的经费依赖临时拨款，场地资源被教学科研挤压，难以支撑常态化运行；其二，价值认知错位，师生将港澳台大学生志愿服务视为大学生志愿活动的“附加任务”而非“必修课程”，削弱其思政教育功能的内生动力。其次，课程内容设计呈现显著的“知行分离”特征，存在理论实践的二元割裂。在理论教育层面，思政课堂对志愿精神的渗透流于形式，未充分考虑港澳台大学生的志愿服务需求与经历。教师多以“案例点缀”方式提及志愿服务，缺乏专题化、系统化阐释以及教材建设滞后，教学内容缺乏中华传统美德如恻隐之心、兼济天下等与志愿精神的文化联结，使在陆港澳台大学生难以建立价值认同^[9]。在实践教学层面，实践指导呈现空心化，不仅未设计针对港澳台大学生的个性化志愿活动，同质化严重；也未能结合高校专业特色开发课程化志愿服务与实践融合的模块，严重忽视思政目标融入，这种脱节导致学生参与呈现“兴趣驱动”或“功利化倾向”，未能内化“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本质，无法深化对服务社会本质的理解。

再次，课程运行机制也存在三重断裂带。第一，师资协同断裂。在针对港澳台大学生的志愿活动中，带队的思政教师缺乏实践指导能力，校外志愿团队也未被纳入教学团队。在此情形下，共青团主导的管理模式造成“多头管理”，专业教师参与度低，理论教学与实践指导沦为平行线。举例来说，在国情教育时，带队思政老师与校园志愿团队均未关注到港澳台对思政教育的可接受性，以填鸭式的教育方式看待志愿服务与思政教育，使得港澳台大学生出现“身在心离”的情况。第二，过程评价缺失。现有评估依赖“服务时长记录”与“心得体会”，具有强主观性与形式主义倾向。缺乏对德性养成、能力提升的过程性观测指标，更未建立服务对象、指导教师、学生自评的多元评价模型。第三，反思环节虚置。活动结束即课程终点，缺乏“实践-反思-升华”的闭环设计。志愿活动的组织者通常将志愿活动的结束视为思政教育的终止，忽视了可在志愿活动后邀请港澳台大学生进行过程性评价，从而促进高校思政课程的建设。实践中，教师鲜少组织深度研讨，港澳台大学生未能将服务体验升华为价值认知，使志愿服务沦为“体验式劳动”，弱化思政教育转化效能。

（二）赋能动力机制的功能性缺失

港澳台大学生高校志愿服务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同时面临赋能动力机制的功能性缺失困境。这种缺失集中表现为定位偏离、主体协同断裂、保障体系缺位三重矛盾，制约着“实践育人”效能的释放。就目标定位偏离而言，存在育人内核被功利性评价消解，目标动力错位的问题，一方面，高校对志愿活动的设计偏离思政教育主线，未能围绕理想信念教育、价值引领等核心任务系统布局。活动多聚焦于“参与规模”等量化指标，忽视学生在服务中德性养成与实践能力的内化过程，导致志愿精神沦为形式化符号。另一方面，评价机制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高校激励手段单一，过度关联评奖评优，强化了学生的功利动机；而社会用人单位仅关注志愿服务“荣誉背书”，忽视其培育的综合

素养。这种目标与评价的双重异化，使志愿服务沦为“学分工具”，消解了其思政教育价值。实践中，港澳台大学生还存在激励失灵的情况，志愿服务的有利评价对港澳台大学生而言，其促进作用往往要比一般大学生小得多，概因于港澳台大学生对入团、入党、考公的需求不足。因此，需要从更广的维度探讨港澳台大学生志愿服务的激励因素。

就主体协同断裂而言，育人共同体的协同齿轮呈现多重啮合失效。部分港澳台大学生端受功利思潮侵蚀，部分参与者将志愿服务异化为个人资本增值手段，对“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内核认知模糊。教师端存在双重脱节：思政课教师对志愿精神的课堂渗透流于碎片化讲解，缺乏深度理论阐释；实践指导则因经验差异形成能力断层，且校内外师资资源整合机制缺失。管理端的共青团体系更陷入“权责模糊、多头管理”的治理迷局，未能构建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的顶层设计。学生、教师、管理者三大主体如同失联的齿轮组，在各自轨道空转却无法形成育人合力。

就保障体系缺位而言，可持续赋能所需的支撑体系呈现全面孱弱。在机制设计维度，志愿活动深陷“项目制”泥沼，缺乏课程化、常态化的制度载体——培训零散、教材缺失、学分认定模糊等问题，阻断其融入思政教育主渠道的可能。针对港澳台大学生的志愿资源在供给维度则面临双重挤压：经费依赖行政拨款且杯水车薪，场地设施被教学科研强势侵占；法律保障缺位使学生权益保护与风险防控悬置半空。总而言之，港澳台大学生在人身价值、职业规划等方面的差异加剧了高校志愿服务赋能思政教育所出现的“单轮驱动”疲软、社会力量参与薄弱、大学生内生动力不足的困境。

（三）志愿协同网络的系统性梗阻

志愿服务作为港澳台大学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载体，其充分赋能还面临组织协同系统性不足的梗阻，继而制约了育人合力的形成。第一，校内组织架构呈现“孤岛效应”。具体来说，港澳台大学生非团员身份导致其很少有机会参与志愿服务，甚至割裂了其与志愿服务的距离。高校志愿服务多由共青团单一主导，思政教师、学工部门、专业院系等育人主体各自为政，缺乏跨部门协作机制。这种割裂使志愿服务被窄化为“团学活动”，既未纳入人才培养顶层设计，也未与思政课程体系形成内容呼应，最终导致“实践归实践，理论归理论”的分立。在此分立的基础上，港澳台大学生因不具备团员身份而与团组织的紧密度不够，继而参与志愿活动的机会与积极性不足。

第二，管理机制存在权责虚置，未将港澳台大学生充分融入现行志愿体系。一方面，校级统筹机制普遍缺位，缺乏由党委主导的专项治理架构，致使资源调配、标准制定、成效评估等关键环节陷入权责真空；另一方面，管理链条在横向协同层面呈现碎片化，团委、教务处、学工部多头管理却职责模糊，项目审批、培训认证、安全保障等环节缺乏标准化流程。特别是在涉及政府服务、公检法等特殊领域，志愿服务对象对志愿者的身份有严格要求，有时甚至对港澳台大学生有政治安全风险的防范，进一步降低了港澳台大学生融入志愿活动的可能。这种机制缺陷催生实践过程的系统性失调，活动策划脱离专业特色与思政目标，临时

性、碎片化的活动组织成为常态、实施过程陷入“招募重量轻质、培训岗前速成、服务过程失导”的操作困境以及服务结束后更面临“人走场散、经验断层、改进无径”的延续危机。专业力量遭遇“双师断层”，校外实践导师无法深度参与育人设计，校内教师又缺乏实务经验支撑人力资源配置呈现“潮汐效应”，志愿者依赖项目制临时动员，导致大型活动时人满为患、日常服务时无人问津的结构性失衡。这种封闭性不仅造成服务项目同质化，更阻断学生专业潜能向公共服务领域的转化通道。当志愿服务被束缚在校园内，其培育社会责任、涵养公共精神的本质功能必然式微。

（四）智能技术赋能的联动性不足

如何利用好智能技术，并使其最大化发挥联动作用，成为制约港澳台大学生志愿服务赋能思政教育的另一瓶颈。具体体现在数据管理、资源匹配、过程监控及场景拓展等维度。就数据管理而言，其呈现明显的碎片化。高校普遍缺乏统一的港澳台大学生志愿服务信息中枢，港澳台大学生志愿活动数据散落于团委、学工、院系等孤岛系统。港澳台大学生志愿者的服务轨迹、能力成长等关键要素未能实现标准化采集与动态更新，致使育人成效评估沦为无源之水。评价体系仍困于传统“公章认证”与主观心得，既无法量化服务过程中的价值内化深度，更难规避“刷时长”等行为异化。这种数据黑箱使港澳台大学生志愿服务成为无法透视的“暗箱实践”。就自愿匹配而言，智能算法始终处于缺位状态。现有技术尚未构建科学的服务供需耦合模型。系统多停滞于基础信息登记层级，缺乏对服务内容与思政目标契合度的智能诊断能力。港澳台大学生学生能力画像、社会需求图谱、时空资源网络未被数字化整合，导致专业型服务错配严重。例如，港澳台大学医学生未能投身社区义诊，港澳台大学法律生缺席普法现场，育人精准性在技术荒漠中持续流失。

四、港澳台大学生高校志愿服务赋能思政教育的路径建议

针对港澳台大学生高校志愿服务赋能思政教育所面临的课程思政体系、赋能动力机制、志愿协同网络、智能技术赋能等层面的问题，可从制度赋能角度构建双向融合框架、从动力机制角度实施激励保障机制、从组织协同角度搭建湾区服务平台、从数字赋能角度构建智能反馈系统。

（一）制度赋能：构建双向融合框架

港澳台大学生课程体系的结构性断裂阻断了赋能路径，继续重构双向融合框架，以避免“盲目参与－功利反思－价值迷失”的恶性循环。港澳台大学生高校志愿服务重构的路径需构建贯通课堂内外、联结理论实践的课程融合框架，使志愿精神与思政教育实现深度互嵌。

首先，通过重构港澳台大学生课程结构打破学科壁垒。思政理论课程需系统性融入志愿服务元素，特别是加入港澳台元素，提高港澳台大学生对思政教育的可接受度。例如在“思想道德与法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等主干课程中设立“志愿服务与公民素养”“奉献精神的时代价值”等专题

模块。邓美娇等学者强调，通过理论阐释志愿服务的政治意涵如红色文化宣讲对理想信念的淬炼以及志愿服务的伦理基础如利他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关系及实践路径，为行动提供价值锚点^[10]。其次，通过创新教学机制实现港澳台大学生志愿服务与思政教育的知行贯通。构建“服务性学习”模式是破除割裂的核心路径。例如李薇薇提出，需精心设计“理论讲授－实践服务－反思提升”的闭环如课前通过案例研讨如大型赛会志愿者的责任担当来激发使命意识；课中组织学生带着理论问题参与“三下乡”“社区治理”等实践项目^[11]。如尚清君倡导的“高校－社区”联动实践；课后通过结构化反思如撰写服务日志、小组研讨、成果展示等，引导适度引导港澳台大学生在“红色讲解”中深化党史认知、在“乡村振兴”调研中理解国情政策^[12]。最后，构建师资协同机制与革新评价机制来提供课程支撑。组建“思政教师+专业导师+实务骨干”的跨学科教学团队，一方面提高思政老师对志愿服务的认识，积极地为港澳台大学生提供思政教育机会；另一方面提高志愿活动者对港澳台大学生志愿活动的认知，提供必要的差异性志愿活动，提高志愿活动赋能港澳台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功效。

（二）动力机制：实施激励保障机制

港澳台大学生志愿服务赋能思政教育动力失衡明显，亟需构建多元协同、供需匹配的复合动力保障机制，通过三维驱动实现融合效能的根本性跃升：第一，要重塑价值内驱，激活主体自觉。高校亟需超越行政化动员逻辑，将红色基因宣讲、国际赛会服务等实践转化为价值涵养场域。针对港澳台大学生，通过设计“奉献－成长”的正向反馈机制，引导港澳台大学生体验服务社会的精神获得感与能力提升感，实现其从“功利性参与”向“价值自觉”的深层蜕变。当志愿服务成为港澳台大学生见证自我价值实现的鲜活课堂，其内生动力便获得不竭源泉。第二，建立针对港澳台大学生的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交融的双轨驱动体系：在横向融合专项奖学金、就业就学推荐通道等发展性支持，与优秀志愿者、优秀毕业生等荣誉挂钩；在纵向上实施贯穿服务全过程的动态评价机制。此时，需要积极引导港澳台大学生在大陆同步打造学科特色鲜明的品牌矩阵：医科院校的港澳台大学生可以深耕社区健康管理，农业院校的港澳台大学生可以助力乡村振兴，师范院校的港澳台大学生开展教育帮扶——通过对接学生职业发展需求与社会重大议题，形成“服务赋能成长，成长反哺服务”的价值闭环。这种基于专业认同与价值认同的双重引力，从根本上保障参与的持续性与深度。

第三，将港澳台大学生志愿服务深度嵌入人才培养体系：开发融合思政元素的标准化课程模块，编写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特色教材，建立科学的学分认定与质量评估体系。在编写教材时，要特别关注港澳台大学生这一群体，尤其是在港澳台大学生招生规模较大的学校。推进“专业+志愿”的融合创新：港澳台大学法律生开展社区普法咨询，艺术团队实施公共空间美化，在服务中实现知识转化与价值体现的辩证统一^[13]。第四，构建“实践－反思－升华”的生态循环：通过成长档案分析、服务案例研讨等深度反思机制，将感性体验升华为理性认知；借助数字化平台实现优质项目的跨区域推广，形成自我更新、持续增值的育人生态。

当价值自觉的深层驱动、品牌矩阵的持续赋能、育人闭环的生态构建形成共振效应，港澳台大学生志愿服务便从零散的“活动样本”蜕变为系统的“育人熔炉”。

（三）组织协同：搭建湾区协同平台

针对港澳台大学生志愿服务无法赋能思政教育缺乏平台的组织协同困境，应树立志愿服务为“大思政”生态的关键子系统——唯有打破管理壁垒、构建多元共治的协同网络，方能让志愿精神真正汇入立德树人的主流航道。首先，改变团委“单打独斗”的困局，关键在于发挥党的统筹领导优势。高校应建立“党委统一领导”的核心机制，将港澳台大学生志愿服务深度融入学校立德树人整体规划和思政工作体系。在校党委指导下，明确由共青团组织牵头实施，强力整合党委宣传部、学工部、教务处、马克思主义学院及各院系专业资源，形成目标同向、责任共担的“大思政”协同网络。

其次，搭建高效协同平台与机制，贯通港澳台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内外资源网络。协同不足常表现为信息孤岛与资源错配。对内而言，亟需建立常态化的部门联席会议与信息共享平台，为港澳台大学生打通教务系统的学分认定、学工系统的评优激励、宣传部门的氛围营造、后勤部门的保障支持以及院系的专业力量。对外而言，高校需主动“破圈”，构建“校—地—社”联动生态。从实践情况看，针对港澳台大学生的志愿服务可以全方位展开，在资源链接方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加强企校合作、深耕红色基地、强化社区服务等方式为港澳台大学生提供长期稳定的志愿服务平台，继而实现学校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及共赢。最后，优化协同运作模式，淡化行政指令，立足港澳台大学生群体发展规律，强化志愿服务团体学生自治，实施因校制宜、分类引导策略，推动校区—类型—领域多维差异化发展，联动行业资源，定向扶持公益社团专业化建设，激发参与积极性，最终实现服务提高质量与育人取得实效的双重目标。

（四）数字赋能：构建智能反馈系统

数字技术的系统化应用可为港澳台大学生志愿服务赋能思政教育提供全新范式，其突破路径可从平台构建、流程优化、主体培育及评估创新四个维度展开。第一，打造智慧中枢破除信息孤岛，构建平台。依托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构建一体化平台，整合

“项目发布—智能匹配—过程追踪—效果反馈”全链条。通过“i志愿”系统与其他APP的运用，实现思政实践要求与志愿项目的智能关联。港澳台大学生可精准对接红色宣讲、社区服务等专业契合项目；教师则动态获取服务数据，将鲜活案例转化为教学资源。此类平台既打破团委、学工、教务间的数据壁垒，更使社会资源得以云端汇聚、精准调度，奠定融合的数字基座。第二，智能技术重塑育人全流程。运用区块链技术加密存证服务时长与质量，确保学分认定透明公正；通过AI算法解析港澳台大学生专业与兴趣标签，实现个性化项目推送——根据专业不同，为港澳台大学文学生匹配文化讲解，为港澳台大学医学生对接健康科普。在此过程中，理论学习与实践行动的边界被技术消融，思政教育在数字化情境中获得具象活化。

第三，构建科学评估激活长效循环。建立多维度数字评价模型：智能平台自动记录服务参数，服务对象扫码评价满意度，同伴开展线上互评，港澳台大学志愿者撰写电子反馈日志。通过反馈实现投入与产出的双循环，既替代传统心得体会的模糊考核，又为推优入党、就业推荐提供客观依据。这种赋能本质是以科技重构港澳台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实践场域，在数据流动中实现从“知识灌输”到“知行共生”的育人范式跃升，最终使港澳台大学生志愿服务真正成为行走的思政课堂的智能引擎。

五、结语

本研究通过探讨港澳台大学生志愿服务赋能思政教育现状，基于群际接触理论与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为框架，以国情教育为改革抓手，为高校落实“大思政”育人目标、促进港澳台大学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可行方案。当前研究虽在融合机制设计上取得进展，但未来仍需强化三方面探索：一是建立志愿服务成效动态评估体系，量化分析国情认知提升效果；二是开发适应港澳台大学生特点的课程化志愿服务模块，推动思政教育与专业培养深度融合；三是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联动政府、高校与社会组织资源，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国情教育生态，最终为增强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提供长效支撑。

参考文献

- [1]南方日报评论员.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N].南方日报,2024-05-22(A04).
- [2]肖楚杰.两岸青年学生交流中的群际接触问题研究[D].厦门大学,2019.
- [3]李森森,龙长权,陈庆飞,等.群际接触理论——一种改善群际关系的理论[J].心理科学进展,2010,18(05):831-839.
- [4]霍伟东,陆嘉健,傅承哲.交流何以促进认同?台湾民众“登陆”的身份认同效应及机制检验[J].台湾研究集刊,2019,(06):18-34.
- [5]王刚.志愿服务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探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17):68-71.
- [6]GAERTNER S L, DOVIDIO J F. Addressing contemporary racism: the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J]. Nebr Symp Motiv, 2008, 53: 111.
- [7]傅承哲,莫庭阳,王译屏.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协作的国家认同提升机制——基于一项合作志愿田野调查[J].广东青年研究,2023,37(01):129-140.
- [8]王鹏,于林民,马昭文.新时代高校志愿服务实践育人功能发挥的路径探析[J].北京教育(高教),2022,(08):38-40.
- [9]田萌,马建青.党建引领下高校志愿服务育人工作的提升进路[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22):67-70.
- [10]邓美娇,梁永康.论志愿服务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径[J].广东青年研究,2024,38(04):110-117.
- [11]李薇薇.高校社会实践育人体系构建的路径选择[J].中国高等教育,2021,(09):58-59.
- [12]尚婧君,蒋云亮.我国大学生社区志愿服务的优化路径[J].人民论坛,2020,(35):84-86.
- [13]李春亭,王娟艳.高校志愿服务组织的运行现状、发展瓶颈与提升路径——基于云南M大学的实证分析[J].高校共青团研究,2018,(02):104-111.